

War, Exile, and Cultural Resilience: Yu Dafu's Sumatra Chinese Diaspora Experience

战争、流亡与文化坚韧：郁达夫的苏门答腊华人流散经验

| Alpin Gadman Markali |

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li_zhibin@qq.com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Yu Dafu's Random Poems of War and Exile, composed during his wartime exile in Sumatra,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shadow of World War II.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d thematic analysi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how Yu's poetry captures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war, the loneliness and alienation of life in a foreign land, deep attachments to homeland, and struggle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t also highlights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preserving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xercising moral responsibility amid political turmoi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Yu's poetic work is not merely a personal record of exil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collective hardships and spiritual stat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wartime Sumatra. By foregrounding themes of resilience and cultural survival,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diaspora'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diaspora literature studies. While limited by its focus on a single text, this research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future inter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s that integrate broader historical sources and narratives of diaspora.

KEYWORDS

Chinese Diaspora; random Poems of War and Exile; Sumatra; wartime exile; Yu Dafu

引言

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华人的流散与迁徙受到文化、教育、政治及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貌。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区域，印尼苏门答腊的华人群体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努力确立自身身份认同，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维系与中国的文化联系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当地环境，然而，面对殖民统治、战时动荡及民族认同问题，他们往往经历身份认同的挑战，甚至被迫做出生存抉择。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流亡经历成为考察当时华人命运的一个典型案例。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许多华人为了躲避日军的迫害，纷纷向马来亚及印尼地区迁徙，苏门答腊成为重要的避难地之一。郁达夫亦在战乱中流亡至苏

门答腊，隐姓埋名，以“赵廉”为化名，在当地华人社区中生存。然而，他的经历并未逃脱二战时期华人所面临的普遍困境——身份认同的挣扎、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战争带来的直接威胁。尽管他积极参与文化活动，试图融入流亡社群，但最终仍难逃日军的清剿，与许多华人一样，被怀疑、被迫害，最终遇害。

郁达夫的经历与苏门答腊华人的社会政治状况息息相关。当时，日军占领印尼后，对华人展开了“肃清”行动，尤其针对抗日背景的华人知识分子和社团领袖。许多华人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不得不采取低调策略，甚至被迫与日军合作以求自保。这种两难处境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剧，也折射出整个华人群体在战时所承受的极端压力。此外，一些华人试图通过经济手段、社会关系或文化活动来维持自身安全，郁达夫的文化人身份和处境亦反映了这一现实。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以感伤和颓废风格著称，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密切相关。他的代表作《沉沦》深刻展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隐喻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他的作品不仅表达个人情感，也反映时代背景，尤其关注身份认同和流散经验。

郁达夫于1938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在南洋地区留下了重要的文学足迹，其文学活动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刘俊, 2018)。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经历虽然较少被深入研究，但对他的创作和思想影响深远。当时，印尼华人社群面临歧视、同化压力和战时政权的冲击，他的流亡生活与这一历史现实紧密相连。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民族身份和社会变迁的思考，或许也影响了他的文学主题。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书详细记录了郁达夫的流亡过程(铃木正夫, 2023)，填补了其生平研究的空白，同时提供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人流散的历史视角。书中不仅展现了他在印尼的生活和最终被日军逮捕的经历，还揭示了当时华人社群在战争中的挣扎与抗争。这本书不仅是郁达夫生平的重要记录，也对华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分析郁达夫的苏门答腊经历，可以更深入理解他对身份认同的探索，以及流散经验对华人群体的深远影响。

二战时期苏门答腊华人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错综复杂，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重要经济力量，华人群体在政治动荡、种族紧张和经济不确定的环境下艰难生存。这些因素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立场，使他们不得不在动荡的权力格局中寻找生存之道。

苏门答腊华人在当地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贸易和商业领域。日本占领时期，他们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受到影响。日军政权对华人实施严厉的歧视政策，将其与土著群体区别对待，导致华人经济遭受严重打击(Ooi, 2015)。尽管如此，华人群体依靠其广泛的经济网络，特别是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贸易中心的联系，在动荡时期维持了生存和适应能力(Jumhari, 2024)。这些跨国商业关系帮助他们在战争和占领带来的经济困境中找到生存空间。

在社会层面，华人群体作为殖民阶级体系中的中产阶级，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并在危机时期成为替罪羊(Sahrasad, 2019)。这种边缘化现象一直持续到后殖民时代，华人群体往往被政府和社会视为外来者(Chong, 2016)。在政治上，华人群体处于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他们必须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权衡，以保护自身利益。因此，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模棱两可，既对殖民势力保持警惕，也对民族主义势力持谨慎态度。

华人群体的社会互动深受其经济角色和当时种族关系的影响。他们常常遭受社会排斥，并被迫同化，甚至放弃自身文化认同，以避免遭受迫害。尽管如此，还

有华人群体仍然保持着独特的文化身份，并通过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然而，国家政策往往倾向于强制同化，使得华人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或边缘化(Suryadinata, 2004)。

郁达夫的经历正是这一华人流散史的缩影。作为流亡知识分子，他在殖民政权、日本占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交织中求生，依赖华人商业网络维持生计，并在不同社群中寻找立足点。他的经历反映了华人流散的现实，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海外的适应与身份认同的重构。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期间创作的《乱离杂诗》进行深度解读，探讨其作品所承载的东南亚华人流散经验。由于研究对象为历史文学文本，并强调文本背后所映射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问题，因此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范式，结合文本细读法、主题分析法与历史语境分析法等多元方法，以确保研究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研究结果及探讨

《乱离杂诗》的流散经验书写

本文以郁达夫的《乱离杂诗》为研究对象。《乱离杂诗》是现代作家郁达夫于1942年流亡南洋期间写成的七言律诗组诗，共计十二首。诗作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八首聚焦诗人与李晓音在战乱环境下的情感纠葛，呈现个体命运在时代动荡中的漂泊与无常；后四首则转向家国主题，通过“长歌正气”“草檄书生”等意象体现其革命精神与民族责任。该组诗以古典诗歌形式寄寓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情绪，将个人情感、民族危机与文化认同交织在一起，是理解其流亡心态与侨居经验的重要文学文本。

在材料选择上，本文主要依据《郁达夫诗词笺注》(郁达夫 & 詹亚园, 2013)和《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铃木正夫, 2023)这两份关键原始资料，并通过将逐首分析重构为主题式探讨的方式，旨在深入揭示诗歌所承载的战争创伤与颠沛、异乡孤独与乡土情结，以及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知识分子的承担等核心流散经验，从而全面阐释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深刻内涵。

1. 战争阴影下的创伤与颠沛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描绘了太平洋战争阴影下华人群体的流散经验，尤其聚焦在战争所带来的身体与心理创伤。诗歌通过直接的战乱描写和含蓄的意象，展现了历史的创痛与个体感受之间的复杂张力(Ko Chia-cian & Sun Pingyu, 2022)。《乱离杂诗》在流散经验书写中，核心内涵在于揭示战争对个体和群体造成的深远创伤，以及华人在颠沛流离中所承受的身体与心理折磨。

直接描写与身体创伤：诗歌直接描绘了战争的残酷现实，如“又见名城作战场，势危累卵溃南疆”（第一首）。这里的“战场”和“溃南疆”不仅指具体的地理沦陷，更是华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摧毁的写照。这种直接的描写带来了身体上的威胁与伤害，如新加坡“肃清行动”中大规模的屠杀与劳役，使得华人群体面临生存的巨大危机。诗句“石壕村与长生殿，一例钗分惹恨长”（第一首）联结杜甫《石壕吏》的意象，暗示了战乱中平民被迫征召、骨肉分离的苦难(谭云华 & 杨黎, 2009)，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重演，更是南洋华人在日军统治下所经历的屠杀和劳役的直接映射，是集体身体创伤的呈现。

间接意象与心理创伤：诗歌大量运用间接意象，细腻地呈现了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如“空梁王谢迷飞燕，海市蜃楼咒夕阳”（第一首）通过典故，描绘了曾经的繁华与安定化为泡影的失落。这种“海市蜃楼”的幻灭感，是对华人曾经构建的安稳生活的无情摧毁，带来了深重的心理打击。“今日岂知明日事”（第四首）和“茫茫大难愁来日”（第七首）直接表达了流亡者对前途的迷茫和恐惧。这种对未来的无力感，使得他们在精神上长期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即使暂时栖身，内心也难以安定。“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第十首）更是将这种无所适从、归途迷茫的心理推向极致，流亡者如同孤雁，不知何去何从。

历史创痛与个体感受的张力：郁达夫的诗歌成功地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注入了个体化的细腻情感。例如，“月正圆时伤破镜，雨淋铃夜忆归秦”（第五首）和“誓记钗环当日语，香余绣被隔年熏”（第三首）将个人与李晓音的离别之痛，化用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使得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中的离散经验产生共鸣。这种张力使得诗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战争如何撕裂个体生命、摧毁情感纽带的深层表达(赵刘昆 & 张振宇, 2024)。诗中的“愁”和“恨”不仅仅是郁达夫个人的哀愁，更是整个华人群体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普遍苦难和无法释怀的悲痛，将个体创伤升华为集体创伤的象征。

2. 异乡的孤独与乡土情结

《乱离杂诗》描绘了诗人在战乱中远离故土、亲友音讯隔绝所带来的孤独感，以及这种孤独感背后隐藏的、对家乡深沉而无法割舍的思念。这种孤独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隔离，更是精神上无所寄托、无法言说的苦闷。而乡土情结则如影随形，成为诗人排解孤独、寻找精神慰藉的重要寄托，即使身处异乡，心也紧紧牵挂着故土的一切(Josh Stenberg (石峻山), 2022)。这种孤独与乡愁的交织，构成了华人流散经验中最为动人心弦的篇章。

音讯隔绝下的孤独与牵挂：战争切断了流亡者与故土亲人之间最基本的联系，使得孤独感倍增。诗歌通过“书信”这一意象，精准捕捉了这种音讯隔绝带来的精神创伤。“望断天南尺素书，巴城消息近何如？”（第二首）这句诗直接点出了信息隔绝带来的孤独与焦虑。“望断”二字，极富画面感，描绘了诗人站在异乡遥望南方，苦苦期盼家书却了无音讯的绝望。这不仅仅是郁达夫个人的经历，更是当时无数流散华人的普遍遭遇——他们身在异乡，心系故土亲友，却无法得知其安危。这种信息的真空，使得思念如同无底洞般吞噬着内心，加剧了异乡的孤独感。“谣诼纷纭语迭新，南荒末劫事疑真。”（第五首）在音讯隔绝的背景下，“谣诼纷纭”更是加剧了流亡者内心的不安与孤独。真假难辨的传闻使得故土的安危、亲人的境况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不确定性比确切的坏消息更令人煎熬。诗人身处“南荒”，对故乡的一切都只能通过零散的、不可靠的信息去猜测，这种无力感使得孤独越发深沉，因为连思念都缺乏确凿的寄托。

空间疏离下的漂泊与思乡：地理上的远离和频繁的迁徙，使得流亡者与故土在空间上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这种疏离又激发了强烈的乡土情结。“避地真同小隐居，江村景色画难如。”（第四首）诗人虽身处看似宁静的“江村”，用“小隐居”来形容，但“避地”二字却揭示了这种“隐居”的被动性。这不是主动归隐田园，而是被战乱逼迫的流亡。尽管景色宜人，却“画难如”，说明诗人内心深处仍充满漂泊感，异乡的美景无法真正慰藉他思乡的心。这种身在异乡却心系故土的矛盾，凸显了空间疏离带来的孤独感。“满地月明思故国。”（第七首）此句是典型的触景生情，直接抒发了诗人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明月作为传统的乡愁意象，在异乡的夜空中显得格外皎洁，却也因此倍增了诗人的孤独与思念。月光所照之处，思

念便无边无际地蔓延，这是一种普世的乡愁，也是流散华人在异乡夜晚最普遍的情感体验。“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园情。”（第九首）“细雨蒲帆”营造出江南水乡的意境，却伴随着“游子泪”，将异乡漂泊的孤寂与眼泪融为一体。“春风杨柳”是故园的象征，在异乡的细雨中，故园的景象被春风吹拂着，显得格外清晰而遥远。这种景物与情感的对比，将异乡的孤寂与对故园的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是诗人内心乡土情结最直接的写照。

精神困境中的故土依恋：在战乱导致的精神绝望中，故土情结成为支撑流亡者的一种精神力量，但也常常因此加剧内心的煎熬。“苦无灵药慰相思。”（第十一首）这里的“相思”不仅仅指对亲人的思念，更包含了对故土、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诗人身处异乡，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无药可医的不仅是思念的痛苦，更是报国无门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加剧了精神上的孤独，使得乡愁变得更加沉重，难以排解。“解忧纵有兰陵酒，浅醉何由梦洛妃。”（第六首）诗人试图借酒消愁，但即使有美酒也无法真正排解内心的忧愁。这里的“洛妃”可能指代故土或心中所爱之人，象征着精神上的寄托。然而，现实的困境使得诗人连在醉梦中都难以回到故土，无法与思念的人重逢。这反映了在极致的孤独中，连梦境都无法给予慰藉，故土情结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痛点。

《乱离杂诗》通过这些饱含深情的诗句，成功地捕捉了战争阴影下华人在异乡所承受的孤独与乡愁。这种书写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思念，更深入挖掘了音讯隔绝、空间疏离、以及精神困境所带来的多层次创伤（金柄珉，2025）。郁达夫以其独特的诗性语言，将个人情感融入集体记忆，使得这些诗篇成为研究华人流散文学中“异乡的孤独与乡土情结”主题的重要文本。

3. 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文化传统的坚守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描绘了战争和流亡如何撕裂个体原有的身份认同，迫使华人在异文化环境中重新审视“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深层命题。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源于对故土的远离、对原有社会地位的丧失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贺诗雨，2025）。同时，诗歌也展现了华人群体在困境中，通过回归和坚守中华文化来寻求精神慰藉、维系民族认同的努力。传统文化不仅是他们抵抗异化、对抗遗忘的武器，更是连接故土与族群的精神纽带，是流散者在漂泊中寻找“根”的最后港湾。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坚守，彰显了华人即便身处异乡，也从未放弃民族精神的韧性。

身份地位的骤降与自我认同的冲击：战争和流亡使得华人原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光环瞬间褪去，这种巨大的落差对流亡者的自我认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第七首）这句诗以强烈对比的意象，直接表现了郁达夫本人及广大华人精英在流亡中身份地位的急剧贬损。“凤凰”象征着诗人昔日作为著名作家的辉煌与才华，然而在战乱中，他被迫隐姓埋名，化身“凡鸟”，只能靠乡村教师或翻译为生。这种从精英到平民的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丧失，更是对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沉重打击。后半句的“精卫临渊是怨禽”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挫败感——即使心怀不屈的抗争意志，面对深渊般的绝境，也难免心生怨愤，这种“怨”是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对身份落差的无声控诉。“避地真同小隐居，江村景色画难如。”（第四首）“避地”二字揭示了这种“隐居”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迫流亡的结果。诗人试图以“小隐居”来合理化自己的处境，但内心深处的漂泊感却无法被“江村景色”掩盖。这种表面与内心的矛盾，反映出流亡

者在异乡试图适应但又难以真正融入的困境，他们的身份不再是故乡的文化精英，而是异乡的“避难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本身就带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困惑。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民族认同的维系：面对身份的困惑，流亡华人通过回归和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来维系自己的民族认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石壕村与长生殿，一例钗分惹恨长。”（第一首）这句诗巧妙地融合了杜甫的《石壕吏》和《长生殿》两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意象。前者代表了战乱中平民的苦难和分离，后者则象征着爱情的誓言和最终的离散。郁达夫将这些典故用于表达华人在战乱中的骨肉分离和情感破碎，这种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运用与坚守。通过引用这些深入人心的意象，诗人将个人和华人群体的悲剧融入到宏大的民族记忆中，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即使身处异乡，其情感根源依然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镇日临流怀祖逖，中宵舞剑学专诸。”（第二首）这两句诗直接引用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典故。“祖逖”代表着晋代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专诸”则象征着刺杀吴王僚的牺牲精神。诗人通过“怀”和“学”这两种主动的行为，表达了在流亡困境中对民族气节和抗战精神的坚守。这不仅仅是郁达夫个人的精神写照，更是当时南洋华人群体民族认同的体现——即便远在异乡，他们依然心系祖国安危，传承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种对历史英雄的追慕，是他们在异文化环境中维系民族身份认同重要方式。“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第十二首）这里的“长歌正气”明显指代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是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诗人通过“重来读”这种行为，表明在最艰难的流亡时期，他依然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坚守民族气节。虽然诗人自谦“路已宽”，但实质上仍是借文天祥的形象自励，在困境中保持高尚的民族情操。这体现了文化传统在流亡华人精神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支撑作用，它是他们在身份困惑中找到归属感、坚守民族尊严的重要精神支柱。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通过对身份地位骤降的冲击和对中华传统文化自觉的坚守的描绘，深刻展现了二战时期华人在异文化环境中，如何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并以深厚的民族情怀和文化自觉来维系自身根脉的流散经验。他的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成为一部反映战时华人精神史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文本。

4. 现实生存的挣扎与知识分子的承担

《乱离杂诗》也展现了流亡者在战争阴影下，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是身体上的奔波与适应，更是精神上的挣扎与妥协(Sai & Hoon, 2012)。与此同时，诗歌也深刻揭示了郁达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定位与责任感。他不仅是受难的个体，更是具有批判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思考者。面对民族危亡与同胞苦难，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努力寻找出路，通过诗歌记录历史、抒发愤慨，甚至以实际行动参与抗争，展现了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道德勇气与历史担当。这种“现实生存的挣扎”与“知识分子的承担”相互交织，构成了诗歌的厚重底蕴。

现实生存的挣扎：颠沛、适应与无奈。战争彻底打乱了华人原有的生活秩序，迫使他们为生存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挣扎体现在身体的疲惫、物质的匮乏以及对异乡环境的被迫适应。“道阻河梁再卜居。”（第二首）这句诗直接描绘了流亡华人为了躲避战乱而不断迁徙、居无定所的现实。“再卜居”不仅意味着寻找新的住处，更暗示每一次安顿都是暂时的，前途依然充满未知。这种持续的颠沛流离，是身体上的巨大消耗，也反映了华人在战火中为了生存而奔波挣扎的普遍困境。“穷途裘敝感黄金。”（第七首）“裘敝”意指衣衫褴褛，直接点明了流亡者在物质上的极端困境。在战乱中，许多华人失去了一切财产，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

维持，不得不面临贫困与饥饿的威胁。这时，“黄金”的珍贵并非奢望，而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这句诗揭示了华人在“穷途”末路之时，为了生存所承受的物质匮乏与窘迫，是一种深切的现实生存挣扎。“闲来蛮语从新学。”（第四首）这句诗反映了流亡华人为了在异乡生存所做的适应性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蛮语”（指印尼语）既是与当地人交流的需要，也是融入当地社会、求得生机的手段。对于郁达夫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学习新语言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非兴趣使然。这体现了流亡者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变、适应新环境的现实，是生存挣扎中带有文化意味的一面。

知识分子的承担：思考、批判与抗争。郁达夫作为知识分子，在个人流亡的困境中，并未放弃对时代命运的思考和批判，并以诗歌为载体，表达了其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关注和投身抗争的决心。“明知世乱天难问，终觉离多会渐稀。”（第六首）这句诗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时代困境的清醒认知。“世乱天难问”不仅是对战争无序、世事难料的无奈，更是对宏大历史进程中个人无力感的悲叹。尽管现实残酷，但诗人依然感受到“离多会渐稀”的悲凉，这种对人伦关系的洞察，展现了知识分子对生命个体在战火中遭遇的深层思考与共情。他看到了小我的悲剧，也理解了大我的困境。“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第十二首）这里的“长歌正气”无疑指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是中华民族气节与精神的象征。郁达夫在流亡的艰难时刻“重来读”，表明他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坚守气节来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自谦“路已宽”，或许是出于对先贤牺牲的崇敬，但也暗示了在传承民族精神的道路上，知识分子责无旁贷。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弘扬，是乱世中知识分子承担历史责任、维系民族脊梁的体现。“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第十一首）这几句诗是郁达夫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困境最直接、最激烈的承担与抗争宣言。诗人不仅不惧怕死亡，反而将复仇雪耻视为高于生命的使命。“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展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大义与抗日决心，即使身处异乡、个人力量有限，也依然心怀收复国土的雄心壮志。这种慷慨激昂的言辞，超越了个人生存的挣扎，升华为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承担，体现了他在精神层面对抗侵略、唤醒民智的知识分子本色。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通过对华人现实生存挣扎的细致描绘，以及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困境的深刻思考与勇于承担的展现，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流散经验书写”。诗歌不仅记录了个人的颠沛与苦难，更传达了在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精神坚守与抗争意志，使其成为一部兼具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的史诗。

郁达夫与苏门答腊其他华人流散者的“异”与“同”

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经历，既展现了与同期华人流散者普遍的相同之处，也凸显了其作为知名作家的个体特殊性，尤其体现在其文学表达的独特视角和对知识分子困境的深刻反思上。

1. 相同之处：流离、抗争与互助的共鸣

共同的战争威胁与被迫流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中国文化界人士为躲避战火南下，新加坡和印尼成为主要流亡地。郁达夫于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与胡愈之、巴人（王任叔）等人乘船，流亡到苏门答腊岛。他们都面临着日军侵略的直接威胁和生存的巨大挑战，被迫隐姓埋名以求自保。郁达夫化名“赵廉”，经营

酒厂；胡愈之化名“金子仙”做记账员；王任叔化名“王弘或王任”，在咖啡园从事农务。这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现实是他们共同的底色(王谦宇, 2011)。

华人社群的互助精神：在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华人社群的互助精神至关重要。胡愈之、郁达夫、巴人等人在苏门答腊流亡初期，得到当地爱国华人的照应，安排住宿，供给膳食(高莉娜, 2023)。郁达夫的诗歌中也流露出对友人帮助的感激，例如《初低至嘉丽赠陈长培》中“犹幸知交存海内，望门投止感深情”的诗句，反映了他在异乡得到接济的温暖。这与当时苏门答腊华人通过宗乡会馆、商业网络互相扶持的普遍现象相符，华人群体依靠其广泛的经济网络，特别是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贸易中心的联系，在动荡时期维持了生存和适应能力。

普遍的爱国与抗日情怀：郁达夫在《乱离杂诗》中引用了“祖逖”（“镇日临流怀祖逖”）和“专诸”（“中宵舞剑学专诸”）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典故，表达了在流亡困境中对民族气节和抗战精神的坚守。这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文化人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的行动相呼应。胡愈之曾撰写《少年航空兵》一书，旨在对海外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展现对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心(张又君, 1986)。王任叔在流亡印尼期间也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利用文学才能唤醒当地华人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王谦宇, 2011)。这体现了流亡文化人及整个华人群体普遍的爱国和抗日情怀，即便身处异乡，依然心系祖国安危，传承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2. 相异之处：文学表达的独特视角与个体精神深度

文学艺术的独特性：郁达夫的《乱离杂诗》以其独有的感伤和颓废风格，对流亡带来的内心创伤与挣扎进行了更私密、更深刻的剖析，其文学艺术性在于通过个体心境的细腻呈现，揭示战争对个体和群体造成的深远创伤。他运用间接意象，如“空梁王谢迷飞燕，海市蜃楼咒夕阳”描绘了繁华幻灭的失落；将个人与亲友的离别之痛，化用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月正圆时伤破镜，雨淋铃夜忆归秦”），使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中的离散经验产生共鸣，从而将个体创伤升华为普遍的战争苦难象征。

相比之下，胡浪漫与郁达夫的唱酬之作，虽然饱含对友人的关切和对时局的感慨，但其表达侧重点与郁达夫有所不同。例如，胡浪漫的《闻达夫避难苏岛，诗以寄之》中“天外故人差幸健，愁中浊酒且添杯”主要表达了对友人安危的慰藉与期望；而他的《危城日日盼来音》中“驿路梅花抵万金”则侧重于乱世中通信的珍贵以及对友人流亡细节的关注（如“谁信相如甘卖酒”指郁达夫开酒厂掩饰身份，“争传公冶善言禽”暗示他懂日语被日军利用）。胡浪漫的诗歌更具“诗史”笔法，如他的《岁暮》一诗，通过徐庶、刘邦、荆轲、陆游、百里奚等历史人物典故，抒发的是个人在胁迫下“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和推翻日军暴政的愿望，将个人遭遇融入更宏大的民族抗争叙事中(张曦娜, 2021)。虽然两者都关注战争苦难，但郁达夫的诗歌在情感深度、意象运用以及对个人内心创伤与身份挣扎的剖析上，展现出其独特的、更具内省性的艺术风格。

知识分子的特殊困境与身份重塑：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其流亡经历和作品深刻展现了个体与社会冲突，尤其关注身份认同和流散经验的张力。他从“凤凰”般的知名作家到化名“赵廉”、经营酒厂的“凡鸟”身份骤降，这种落差对他个人价值和自我认同造成了巨大冲击。他在诗中反复思索身份认同的张力（如“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并试图以“小隐居”来合理化“避地”的处境，但内心深处的漂泊感和失落感难以掩盖。这种对身份重塑的深刻思考和挣扎，是郁达夫个体经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所在。

尽管胡愈之和王任叔（巴人）等文化人也面临类似的流亡困境，被迫隐姓埋名并从事与原有职业不符的劳动——胡愈之化名“金子仙”做记账员，王任叔化名“王弘”在咖啡园务农——但他们留下的同期作品或史料中，较少有像郁达夫那样，直接且深入地通过诗歌来剖析自身作为知名知识分子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落差和内心煎熬。胡愈之在流亡期间，更侧重于实用性的贡献，如主导编纂《印度尼西亚语辞典》，以及其作品所展现的“更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批判性”（费孝通 & 夏衍，1989）。王任叔的流亡经历则更多地体现了其对当地社会和语言的学习，以及后来作为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所展现的政治担当（王谦宇，2011）。他们的适应策略和文学表达虽然也反映了流亡者的坚韧，但与郁达夫那种带有浓厚个人感伤色彩、深入探讨身份迷失的文学表达形成了对比。郁达夫的诗歌，因此成为一部反映战时华人精神史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文本，更具体地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海外的适应与身份认同的重构。

结论

通过对诗歌文本的细致分析，本研究发现郁达夫的诗歌深刻反映了流散者身心所承受的创伤与颠沛流离之苦，异乡环境中难以排解的孤独感与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以及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产生的身份认同困惑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同时，诗歌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严酷现实中的生存挣扎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二战时期东南亚华人的个体命运提供了生动的文学例证，也丰富了我们对流散文学中普遍主题的认识。

《乱离杂诗》作为一部重要的流散文学作品，其研究价值在于通过郁达夫个人化的情感抒发与诗性表达，为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流散群体在极端环境下如何重构身份认同、维系文化根脉以及适应异域生存的理解，更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拓展了流散研究的维度。此外，郁达夫作为一位在乱世中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在苏门答腊的经历与创作，也为考察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道德抉择与文化担当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群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集中于郁达夫的《乱离杂诗》这一单一文本，尽管其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但可能无法全面涵盖二战期间苏门答腊华人群体流散经验的全部复杂性与多样性。此外，本研究侧重于文学文本的内部分析，对历史档案、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他华人个体的口述史料的结合运用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实证支撑。

鉴于上述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从多个方面进行拓展与深化。首先，建议拓宽研究资料来源，结合更多历史档案、地方志、华人报刊、口述史料以及其他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以构建更为宏大和多元的苏门答腊华人流散经验图景。其次，可以进行跨区域或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将苏门答腊华人的经验置于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流散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共性与特性。最后，鼓励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从而对流散文学、身份认同与文化适应等议题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Chong, W. L. (2016). Rethinking the Position of Ethnic Chinese Indonesians.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25(2), 96–108. <https://doi.org/10.22452/sejarah.vol25no2.7>
- Josh Stenberg (石峻山). (2022). “Finding the Distant Homeland Here”: Contemporary Indonesian Poet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8(2), 312–334. <https://doi.org/10.1163/17932548-12341469>
- Jumhari. (2024). Rakit yang Terombang-Ambing: Ambivalensi Sikap Politik dan Orientasi Ekonomi Orang Cina di Palembang pada Masa Revolusi. *Analisis Sejarah: Mencari Jalan Sejarah*, 14(1), 23–28. <https://doi.org/10.25077/jas.v14i1.120>
- Ko Chia-cian & Sun Pingyu. (2022). Chinese-Language Memories under the Conflagration of War. *Prism*, 19(2), 394–410. <https://doi.org/10.1215/25783491-9966707>
- Ooi, K. G. (2015). Cash and Bloo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Borneo, 1941–45. In C. Matos & M. E. Caprio (Eds.), *Japan as the Occupier and the Occupied* (pp. 23–44). Palgrave Macmillan.
- Sahasrad, H. (2019). Colonial Structure, Chinese Minority and Racial Violence in Indonesia: A Social Reflection. *Budapes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Critics Institute (BIRCI-Jour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209–221.
- Sai, S. M., & Hoon, C. Y. (2012).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S.-M. Sai & C.-Y. Hoon, Eds.). Routledge.
- Suryadinata, L. (2004). *Chinese Indonesians: State Policy, Monoculture and Multicultu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赵刘昆 & 张振宇. (2024). 创 Improvement of Linguistic Competence in Chinese 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ents in Indonesia. *Pertani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26(3).
- 费孝通 & 夏衍. (1989). *胡愈之印象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 高莉娜. (2023). 流亡·启蒙·边缘：抗战时期中国“流徙文人”在新加坡、印尼.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 24–35.
- 贺诗雨. (2025). 身份认同、具身意识与离散经验——海外华人导演的纪录片创作探究. *影视文化*, 01, 64–74.
- 金柄珉. (2025). 双重书写与身份认同——李斗山抗日时期在华流亡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 47(03), 19–31.
- 铃木正夫. (2023).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刘俊. (2018). “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兼及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与华文文学的复合互渗. *文学评论*, 1, 161–170.
- 谭云华 & 杨黎. (2009). 论杜甫诗歌的悲剧精神.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5(5), 38–4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9506.2009.05.007>
- 王谦宇. (2011). 巴人流亡印尼大事年表 1942.2.4—1947.9.14. *上海鲁迅研究*, 4, 56–77.
- 郁达夫 & 詹亚园. (2013). *郁达夫诗词笺注* (詹亚园, Ed.).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张又君. (1986). 胡愈之南洋流亡的一个侧影. *新文学史料*, 2, 105–106.
- 张曦娜. (2021, February 22). 从旧体诗看新加坡人文社会——访本地学者林立. *联合早报*.